

身份与象征：解读斯皮格曼的《鼠族》

闫书颖

内容提要：美国犹太作家、漫画家、普利策奖获得者亚特·斯皮格曼的《鼠族》运用象征手法，采用猫、鼠、猪等动物形象分别代表并生动描绘了二战大屠杀中的德国纳粹、犹太人以及波兰族人的不同身份和特征。作者运用动物形象规避了犹太幸存者和幸存者后代的身份所带来的历史沉重感和隔膜感，在更广泛意义上进行了身份的重构，增加了作品的可理解度和接受度，同时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感染力和思想性，使作品达到历史性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并成为大屠杀文学史、漫画界以及文学界的经典之作。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斯皮格曼的《鼠族》中身份的规避和重构、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及作者对于幸存者后代的伤痛、自我身份和自我认识的探寻，揭示其中的艺术特色和思想意义。

关键词：身份 象征 重构 大屠杀 幸存者

作者简介：闫书颖，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跨文化沟通方面的研究。

Title :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Reading Art Spiegelman's *Maus*

ABSTRACT : Art Spiegelman, an American Jewish cartoonist, writer, and the special Pulitzer Prize winner, in his masterpiece *Maus* skillfully applies the artistic technique of representation, using images of the cat, the mouse and the pig to represent respectively the German Nazis, the Jews and the ethnic Pol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onstructing their identity and vividly depict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is essay explores how the author, by adopting the images of the animals, avoids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he former Survivor identity and manages to redefine the identity of the Jews as well as the German Nazis and the ethnic Poles, so as to reveal the artistic and thought-

provoking features and values of *Maus*.

Keywords: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redefine, Holocaust, survivor

Author : Yan Shuying <shuyingyan@126.com> is a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100081).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992年,美国作家、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 1948—)凭借两卷本漫画作品《鼠族》(*Maus*, 1991)获得普利策特别奖,这是普利策奖首次颁给漫画作品。作为一部集纪实文学、漫画、回忆录、自传于一身的作品,《鼠族》以美学、思想性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巧妙统一,在出版后即引起了新闻界、艺术界、文学界以及读者的强烈反响,《华盛顿邮报》称其为“一个令人感动的巨大成功”,《纽约时报》评价其为“用小图片讲述的史诗故事”,《华尔街日报》则将其誉为“对大屠杀最为感人、最成功的记述”。由于作者摒弃了传统的文字,采用漫画形式,以动物形象为主角将父亲口述的大屠杀经历以及自己作为记录者和绘画者的所思所想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该作品展现出突出的艺术表现力和写作技巧,这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们。但迄今为止,对这种艺术手法背后隐藏的深刻思想意义的研究和讨论却远远不足。事实上,斯皮格曼采用具有象征意义的猫、鼠、猪等形象分别代表德国纳粹、受到残酷迫害的犹太人以及沦为纳粹帮凶的波兰族人,并非艺术创作的偶然,而是作者深刻思考了大屠杀中各方的立场、身份、特殊环境中人性的展露以及那场浩劫对幸存者乃至幸存者后代无法消除的创伤的结果,也是作者挣扎、反思、自我身份探寻与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本文从《鼠族》的象征表现手法入手,探讨作者对父辈与己辈的特殊身份——“大屠杀幸存者”、“幸存者后代”——的思考和复杂心理,分析作者利用象征手法进行新身份的构建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与回归过程,揭示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思想性和重要的文学价值,论证作品的艺术表现张力和对大屠杀文学,乃至整个学界的意义。

一、身份的规避与重构

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概念,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研究和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工具,也是深入研究斯皮格曼的《鼠族》的理论依据。身份理论主要观点认为,身份是由一系列的自我观点组成的,这些自我观点是在特定的群体或角色中,通过自我归类或在认同基础上形成的(Stets 22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来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即人们总是自觉地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并给予评价,个体在评价的基础上确定自我身份(Goldberg 561)。两种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强调身份是自我观点这一特性,同时明确身份对社会或特定群体的依赖性。当个体与其他成员共同拥有基本的内部因素,也即某一具体人群拥有共同的特点时,我们认为其形成共享的身份。而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大范围身份共享的共同体。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定义为对其拥护者而言,其主观的价值观,包括文化、宗教和时代的想象的构建,这些价值观由资本和通俗语言——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的扩张而不断巩固和修正。

斯皮格曼作为战后移居美国的犹太移民后代,无论其愿意与否,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犹太民族烙印,“犹太人”是其与生俱来的身份标签,而父母是二战大屠杀幸存者的事实使他的身份

被进一步签注为“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这一身份对斯皮格曼的生活及艺术创作影响深远。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其苦难悲剧史可以追溯到圣经里。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制造的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则成为犹太民族的浩劫。幸存者有的侥幸逃脱,但家庭被毁,或亲眼目睹至亲之人惨死;有的经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炼狱折磨,九死一生幸存下来,但身心早已备受摧残。这种惨痛的经历成为大屠杀幸存者挥之不去的梦魇,也使得大屠杀幸存者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受难群体。远离大屠杀的人们,部分由于大屠杀如此惨绝人寰以至于显得不真实,部分由于大屠杀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几乎毫不相干而仅仅存在于想象中或文字中……或因历史沉重感,或因隔膜感,总之普遍对大屠杀幸存者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社会学家赫尔姆莱克(Helmreich)的调查表明,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犹太移民的大屠杀经历保持沉默,甚至普遍采取了刻意回避的姿态。更有甚者,包括本土以色列人在内,很多人对数以百万计欧洲犹太人毫无反抗、“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理解,甚至怀疑犹太人的受难者以及幸存者的经历,毋庸说给予他们足够的同情了。可以说,“大屠杀幸存者”与“幸存者后代”的身份带来的是苦难、创伤、耻辱甚至怀疑、否定。

在这样一个幸存者、施暴者、公众集体失语的背景下,斯皮格曼在绘制《鼠族》时放弃了真实人物,选择动物形象作为描绘对象,分别用老鼠、猫、猪象征受到纳粹残害的犹太人、德国纳粹和波兰族裔人,既避免了与大屠杀相联的身份的负面影响,又成功构建了新的身份——猫象征“施虐者”、鼠象征“受虐者”,以及猪的“帮凶”的身份。个体在社会中扮演多少个不同的角色,个体就存在多少个不同的自我。社会结构是复杂的,个体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身份,因此个体认同的身份是多重的、复杂的,个体可以拥有多重身份。斯皮格曼及其父母拥有犹太人、美国犹太移民、幸存者、幸存者后代等多重身份,而受害者身份是斯皮格曼在作品中进行身份重构的结果,这使大屠杀不再拘泥于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表层特征,而凸显了其更普遍和一般意义的本质——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残害,就好比自然界中动物间的弱肉强食、猫对老鼠的捕食。这使大屠杀事件的描述和记叙不再那么令人抗拒、遥不可及,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感和共鸣。但当人们真正深入阅读时,不难发现随处可见的德国纳粹和犹太人的踪迹,使人们悚然而惊的同时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大屠杀的残酷性和对犹太人的摧残。

二、身份构建中的象征手法

传统意义上猫的形象温顺、和善、乖巧,但当面对老鼠时,猫天生的本能使它变得凶恶而危险,这与德国纳粹面对犹太人时的凶残狠毒、狡猾奸诈相似至极。《鼠族》中不管是戴着军帽或钢盔的德国军人,还是身着百姓服装的德国平民,都是一副龇着尖牙、张着大嘴、凶猛危险,好像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恶猫的形象,这里的猫代表了德国纳粹“施暴者”的身份。斯皮格曼以统一的恶猫形象代替了德国纳粹以及其他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德国人的个体形象,模糊了其个体身份,但同时,其所代表对象的整体身份和特征变得更清晰,即德国法西斯,也即在希特勒的人种论的驱使下有组织、有计划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刽子手。在这里,究竟是哪个人参与其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法西斯以集体的身份和形象犯下了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当德国士兵边嘴里骂着“没用的犹太人”边把机枪狠狠砸向缺吃少穿却要超负荷劳动的犹太犯人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只带着钢盔的猫对一只老鼠的暴行;当德国士兵在作者父亲所在城市街上对犹太人棍棒相加并开枪扫射时,我们看到的是猫对老鼠的围剿;当德国纳粹为了阻止两三岁的

犹太孩子们的哭闹而狠狠将他们摔到墙上、鲜血四溅时,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猫吃老鼠的游戏……自然界里猫对老鼠有这样的行为是自然法则使然,而当这一切由德国纳粹加诸到犹太人的身上时,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暴虐、丧失人性。可以说,斯皮格曼以这样巧妙的艺术处理手段,表达了“不可表达之事”,描述了“不可描述之事”。^①

与德国法西斯的猫的形象相对应,斯皮格曼用老鼠代表所有受到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它们象征着法西斯魔爪下的像老鼠一样低贱地生存并被屠戮的犹太群体,他们的身份是“受害者”。他们或被德国纳粹赶到森林里集体枪杀;或为了获得聊以裹腹的食物,像暗夜地沟里的老鼠一样,冒着被德国纳粹吊死在街头示众的危险偷偷到黑市换些食物。为了避免被德国纳粹抓走,还会像老鼠一样挖掘地洞作为藏身之处,过着见不得人、苟且偷生的日子。哭号的“小老鼠们”——两三岁的犹太孩子会被德国纳粹直接摔死……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被定期进行身体状况筛查,留下的继续做苦役,体弱或有病的被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杀害。即使在德国纳粹即将失败时,被关押的犹太人还会被用火车运回德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渴死、饿死、压死、病死、踩死,而德国纳粹只管在靠站时让还活着的犹太人将尸体抛下车,大批人死去,一息尚存的也不过在等死……这里的鼠的形象既是“受害者”身份的象征,也是他们生存状况和生存地位的反映。犹太人已经变成了只能生活在黑暗中、肮脏猥琐、任人宰割的老鼠,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生存的权利。面对凶狠残暴的纳粹分子,他们就像见到猫的老鼠,任其戏弄、殴打乃至杀死。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具体的个体形象已经被统一的老鼠形象所代替,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张张老鼠的脸和上面象征眼、鼻、嘴的点或线,没有眼神没有表情,唯一清楚的是在惨遭迫害时因哭号或痛苦而张开的大嘴。犹太人集体的茫然、凄苦、无助以及悲惨处境得到集中体现。

斯皮格曼通过将犹太人去人类化,侧面影射了希特勒所鼓吹的看法——“毫无疑问犹太人是一个种族,但不是人类的种族”(Spiegelman, “Drawing Pens” 46)。正是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希特勒发动了针对全体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这种对犹太民族的去人类化使大屠杀成为可能。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非人类的是禽兽般的纳粹分子,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将自己变成“恶猫”,将无辜的犹太人变成“老鼠”。正如斯皮格曼自己所说,《鼠族》“是与希特勒合作创造的”(“Drawing Pens” 46)。

猪的形象构建了另一重要群体的身份——波兰族人的“帮凶”身份。他们自私冷酷、冷漠贪婪,甚至会落井下石。虽然其中也不乏良善,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曾经与其亲如一家但最后却将前来投靠的弗拉德克夫妇拒之门外的波兰族家庭教师;因为知晓邻居收留了弗拉德克的表弟而进行敲诈勒索的波兰人;欺骗和出卖了弗拉德克和妻子安佳致使他们被德国纳粹抓住并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波兰助逃者。而在奥斯维辛,波兰犹太人会比德国纳粹更残酷地迫害犹太人……这个群体,一方面被德国纳粹压迫和迫害,另一方面,却成了德国纳粹豢养的鹰犬,向曾经的朋友、邻居、兄弟姐妹施以更无情的打击。他们的存在,使饱受伤痛犹太人的命运更加悲惨和无助,客观上成了德国纳粹分子的帮凶,为那段黑暗的历史更添浓重的一笔。

斯皮格曼用一个个动物形象将其所代表的群体清晰化、具体化、抽象化,构建了各个族群的新的身份,明确了他们的特征,使群体形象变得鲜活生动,也使大屠杀历史变得更加触目惊心。

三、自我身份的探寻与回归

犹太人的身份由老鼠代表并得到重新构建,既代表了二战时犹太民族灾难深重的经历,也

寓意奥斯维辛后犹太人身份所带来的痛苦,这种深受创伤的受害者身份对于奥斯维辛幸存者而言不因侥幸存活下来而成为过去,对幸存者后代来说也不因并未亲身经历过残酷的大屠杀而能置身事外。对于以斯皮格曼父亲弗拉德克为代表的幸存者来说,大屠杀成为他们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虽然他们身体逃出了集中营,他们的心和灵魂从未走出过那里,这种痛苦会伴随他们一生。这种挥之不去的痛苦加诸在以作者为代表的幸存者后代身上,对他们的心理和生活持续造成了严重的间接创伤,尤其使他们对自我身份产生厌恶、困惑并为此深受困扰。斯皮格曼对《鼠族》的创作过程,也是他对自我身份探寻并最终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

对于斯皮格曼来说,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这一身份,带给他的困扰和痛苦最初主要体现在与父母亲疏离的关系上。父亲由于纳粹集中营的生活经历变得苛刻、现实、极度节俭,甚至金钱至上,甚至对斯皮格曼的教育也具有冷酷和缺乏温情的特点,这都让斯皮格曼非常反感;而父母对死于大屠杀的第一个儿子的怀念也使他们无力给予战后出生的斯皮格曼应有的关爱。这些造成了斯皮格曼与父母情感上的疏离,是“幸存者后代”这一身份给他带来的痛苦的根源。而最初他对此尚未清楚认识。

随着痛苦变得愈来愈深,斯皮格曼变得非常抑郁,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由此,他意识到父亲的幸存经历对自己的负面影响——使自己怎么做都感到永远不及幸存下来的父亲,而父亲对自己幸存而别人死在大屠杀中的经历感到的犯罪感也传递到斯皮格曼的身上,使他痛苦地体会到与死在大屠杀中的哥哥的隐形竞争以及自己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犯罪感。这种对自己身份及对身份所带来的痛苦的认识,使斯皮格曼对自己的“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身份感到困惑乃至厌恶,因而,此时代表斯皮格曼的老鼠不再是一只老鼠的形象,而是一个带着老鼠面具的人的形象。这一形象,象征着斯皮格曼对自己旧有身份的厌恶反感,但对新的身份究竟为何、该以何面目示人却依然迷茫困惑。

战后犹太人由于大屠杀的影响,其人生观和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分化。有主张放弃犹太信仰者,因为大屠杀摧毁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而为了融入新的环境(战后很多犹太人移民到美国等国家),他们希望摒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特征,开始新生活。也有人依旧执着坚持自己的犹太信仰,严格遵守犹太教的教义和传统。还有一些人既无法真正融入非犹太的世俗世界环境,也无法完全遵守犹太教规,彻底否定自己的犹太特征也使他们苦闷迷惘。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一代犹太人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认识自我的身份,道路艰难。

斯皮格曼最后选择既不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也不摒弃犹太传统对自己的影响,还原一种自我本真的状态。在他看来,种族与身份具有非固定性、非先天性,并不具备连贯性和固定性,也并非不言而喻、不言自明,以种族划分人类的身份本身就是对人类的分化和破坏。所以他在创作中绘制了驼鹿、卷毛狗、青蛙、兔子和老鼠等各种动物形象作为备选。而当被记者问到如果描绘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会采用什么动物形象时,他回答“不知道……豪猪?”(qtd. in Brown 101)他本身不信仰犹太教,虽然他称自己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实际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既不……也不……”的状态和自我认同的稳定带给他的是平静。斯特兹(Stets)认为,这种稳定的身份不仅有利于个体自身,而且有利于交往中的他人,使其行为对他人来说可以稳定预测,反过来,来自他人的稳定反馈又进一步稳定了个体对自身的定义(227)。作品的最后,斯皮格曼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关心,父子关系有了很大缓和。《鼠族》结尾处父母的墓志铭象征着幸存者这代人的逝去和安息,他们的后代则将开始新的生活,一种或许可以逐渐远离大屠杀阴影和创伤的生活。

斯皮格曼在《鼠族》中运用象征手法,用看似荒诞新奇实则富有深意的动物形象分别代表大屠杀中的德国纳粹、受迫害的犹太人和沦为纳粹帮凶的波兰族人,为他们构建了新的身份并赋予其新的特征,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这是作者在艺术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也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历史性高度,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漫画作品的名著。作品将个体形象高度概括并抽象为群体形象,将个人遭遇提升到民族高度,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这场人类的灾难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伤害之深及其非人性的本质,有力控诉了这场暴行,也有助于各层次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作品。在大屠杀文学作品史上,很少有像《鼠族》这样既能保持自己在经典学术界经久不衰的魅力、长久吸引着专家教授学者不断进行广泛探讨和研究,同时也能让无数普通读者手不释卷、欲罢不能的作品,对大屠杀及大屠杀作品研究,对漫画界及文学界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注解【Notes】

- ① 在大屠杀研究领域,有“表达不可表达之事,描述不可描述之事”的说法,意指对大屠杀进行描写时的困难与语言的无力之感。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1983.
- Brown, Joshua. "Of Mice and Memory." *Oral History Review* 16 (1988): 91-109.
- Goldberg, C. B. "Applicant Reactions to the Employment Interview: A Look at Demographic Similarit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6 (2003): 561-71.
- Helmreich, William B. *Against All Odds: 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Successful Lives They Made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 Leary, M. R. and J. P. Tangney.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
- Rosenbaum, Thane. *Second Hand Smoke*.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 Roth, Philip. *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3.
- Stets, J. E. and Buike, P. J.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3 (2000): 224-37.
- Spiegelman, Art. *Maus: A Survivor's Tal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2.
- . "Drawing Pens and Politics: Mightier Than the Sorehead." *The Nation* 17 January (1994): 46.

(责任编辑:陈言)